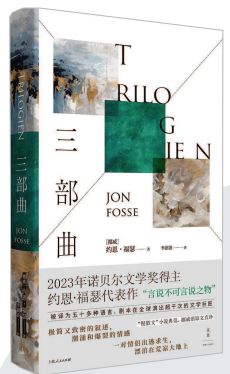




约恩·福瑟的冷酷与喧嚣

■ 谷立立



《三部曲》
[挪威]约恩·福瑟 著
李蔚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约恩·福瑟

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约恩·福瑟的作品，绕不开的是他标志性的极简与沉默。极简源于他对文字的掌控，沉默则是进入人其中的唯一方式。福瑟用他的惜字如金构建了一个静默无音的世界。这里有“无法言说”的命运，也有欲言又止的人生。

倾听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

之所以如此，与福瑟的创作观有着莫大的关联。他自称，年少时他对当众朗读的恐惧，将他推入了难以言喻的孤独。好在，他没有灰心。既然恐惧夺走了他的语言，他就必须把失去的一切全都夺回来。很快，他幸运地“在自己内部找到了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写出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如此独特的创作观，造就了一个笔尖向内的福瑟。在他看来，写作就是倾听。他就像虔诚的冥想者，总是目光内敛，凝神倾听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注定是微小的、静默的、无法言说的。这本最新引进的《三部曲》由《无眠》《乌拉夫的梦》《疲倦》三部分组成。它在静默中开场，又在静默中毫不费力地将两位主人公的窘迫处境展现而出。

“阿斯勒和阿莉达在比约格文（挪威城市卑尔根的旧称）的街上兜兜转转，阿斯勒肩上扛着的两摞东西基本上就是他俩的所有家当，而他的手紧攥着提琴盒，里面是他从父亲西格瓦尔德那继承来的小提琴，而阿莉达拎提着一网兜吃的，现在他们已经在比约格文的大街小巷里转了好几个小时，想找个地方住，但几乎在哪儿都租不到房子……”

没错，无论走到哪儿都找不到想要的房子，的确令人焦虑。这种焦虑在福瑟笔下似乎并不少见。比如在他早期的剧作《有人将至》中，福瑟就用近乎白描的笔法构建了一个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剧中，一对中年夫妻在海边买了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子。表面上，这里偏僻难行，少有人来，四周环绕着“白色的巨浪和黑色的大海”，颇有些“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气质。但其实，这里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乐土。至少，女人从来没有放下她的顾虑。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日暮，她总是在不安之中反复追问，不断质疑，唯恐有朝一日某个来历不明的陌生访客不请自来，搅扰了夫妻俩如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般的独居生活。

诸如此类的顾虑，与高纬度地区最为匮乏的安全感息息相关。似乎是为了不让自己在漫长难熬的寒夜太过焦灼，福瑟的人物总是不约而同地关上了心门。这就像一座隐藏在黑森林深处的小木屋，从上到下的每块木头上都贴满了“生人勿进”的警示。而到了《三部曲》中，这种不安就从隐隐约约、如鲠在喉的猜测，变成了如假包换、不容辩驳的事实：阿斯勒和阿莉达就是不受欢迎的异乡人。此时，阿莉达怀有身孕，即将分娩。如果找不到落脚之处，他们就只能深夜的夜里露宿街头。还好，阿斯勒不顾主人的阻拦，带着阿莉达闯进了一所房子。之后，阿莉达在这里生下

了儿子西格瓦尔德。当然，这并不是阿斯勒和阿莉达第一次遭受挫折。早在家乡杜尔基亚村的时候，阿莉达的母亲就曾当众将这对年轻的情侣赶出门去。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的他们还怀揣梦想，并没有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信心。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会有怎样的未来，而在通往未来的路上，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毋庸置疑，这是福瑟写作恒定的命题。相比于揭露社会弊端、记录时代变迁之类的鸿篇巨制，他的着眼点实在是小之又小：一次偶然的相逢、一则简单的对话、一段久远的往事，就是他写作的全部。但不管他写了什么，福瑟都像诺贝尔文学奖授词所说的那样，始终在“用极具创新意识的戏剧和散文让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声”。

为了离开自己而写作

《三部曲》即是如此。在《乌拉夫的梦》里，阿斯勒改名为乌拉夫。似乎是为了与过去的一切彻底清算，他卖掉了父亲留给他的提琴。而在告别比约格文之前，他独自返回城里，只为了给乌拉夫（阿莉达的新名字）买一只手镯。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无意中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他站在那儿，没人注意到他站在那儿，所有人都忙着自己的事，向这个人或那个人喋喋不休，所有这些声音形成一片嘈杂，一个声音和另一个声音混在一起无法区分，一张脸和另一张脸混在一起无法区分，所有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像同一个刺耳的声音，所有的脸都像同一张脸……”

这一幕发生在酒馆里。这里的嘈杂与弥漫在比约格文街道上的冷酷形成了鲜明对比。恰恰就是在这里，一个老头儿认出了乌拉夫。他宣称乌拉夫就是之前几起谋杀案的凶手。很难说，乌拉夫究竟有没有犯下重罪。毕竟，福瑟从来不必对真相负责，更不会在字里行间留下太多蛛丝马迹。有关案件的一切，就像沉在海底的轮船残骸，除了半真半假的小道消息，似乎没有太多正面描述：没有公开审判，没有罪犯供述。那个自诩为正义代表的老头儿，充其量不过是个上蹿下跳的小丑。尽管他念念有词，“用那细细的女人的嗓

子”，逢人就说“杀人者必偿命”“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但他所谓的正义不过是未被满足的私欲——整个晚上，乌拉夫都没有请他喝酒，这让他无比愤怒。而为了赚到一丁点可怜巴巴的赏金，他不但不肯给乌拉夫买一杯啤酒，更向整个城市的居民大肆渲染乌拉夫的罪行。就像他所说，“那些不肯给他买一杯啤酒的人就是这个下场，那些自己有钱又不想和别人分享的人就是这个下场”。

不知道这是不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但可以肯定的是，福瑟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小径分岔的比约格文。它是如此分裂：前一秒，这座位于世界尽头的城市似乎才刚刚走出冰山，就以它的冷酷将所有不明底细的异乡人统统拒之门外；后一秒，它又像蕴藏着太多能量的活火山，将炽热的岩浆遍洒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于是，所有的人都约而同地涌上街头，以近乎癫狂的姿态见证乌拉夫的死亡。如此一冷一热，两相对比，就像福瑟亲手画就的素描，细致入微地展现出那些早已刻在这个民族血脉里的基因。一方面，他们很冷漠，总是躲在逼仄的蜗牛壳里，不肯轻易对外的世界投去关注的一瞥；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如此狂热，不惜倾巢而出，只为了旁观他人的生死。此时，语言似乎成了多余无用的累赘。它存在的唯一功能不过是最大程度地凸显那些在喧嚣、癫狂之中渐渐失去理性，进而扭曲变形的灵魂。

不过，福瑟并没有说教。在谈论写作的时候，他自称，他是为了离开自己而写作。而他所有的离开，都是为了全方位地观察这片孕育了他的土地。卑尔根是他写作的原乡，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峡湾森林、气候地貌、社会构成、历史走向都了然于心。似乎只要站在海边，眺望窗外连绵不绝的海岸线，他就能毫无挂碍地写出他想要表达的一切。在他看来，阿斯勒的遭遇并非偶然。因为早在故事的开端，一切就有了定论。《无眠》中，流离失所的阿莉达用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揭开了城市生存的潜规则：“有的人拥有很多东西而有的人没有。”甚至，“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可以左右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毫无疑问，阿斯勒就是那个没有财产的人。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小提琴手。每当他拿起提琴，就会忘了自己

身份的卑下。“他不想让步，他只想努力向前，他会制服那一次次重击着的悲伤，他想让那悲伤变得轻盈，越来越轻，升起来，像没有重量那样飞起来，往天上飞，他要使之发生，于是他奋力向前拉呀拉然后他发现了乐声飞扬起来的那个地方然后它盘旋着升起来了，是的，是的，是的，它盘旋着，是啊，然后他不需要再奋力向前，然后这乐声就自己盘旋着飞走了奏出了它自己的世界而每一个能听到它的人，他们都能听出这一点……”

一首“爱的歌”

说到底，这不过是阿斯勒的梦。因为只有借助“飞翔”的意象，他才能逃离命运的泥沼，无限接近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很清楚，小提琴手没有自己的人生。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像祖辈那样，紧紧抓住当下，跟随命运的脚步，亦步亦趋地向前走，既无所谓未来，更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充其量只能是走到哪儿是哪儿。看到这里，是不是会心生错觉，以为自己读到了假的福瑟？但其实是，福瑟从来没有真正远离他标志性的“慢散文”，更无意向他的前辈（也是同胞）易卜生靠拢。他是描摹状态的高手，始终专注于捕捉人物内心瞬间的悸动，而不必像易卜生那样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觉醒负责，进而将痛失爱人的阿莉达塑造为善恶扬善的“美少女战士”。

很难说，阿莉达的前半生究竟有没有爱的存在。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永久地消失了，她唯一记得的只是他悦耳的歌。在后来的年月里，尽管她从来没有从母亲、姐姐那儿感受到一丝丝爱意，但她仍然相信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着让她难以割舍的情感。就像阿斯勒的琴声。阿莉达不会忘记她与阿斯勒初次见面的情景。第一次，阿斯勒登台演奏；第一次，阿莉达从他的琴声中听到了她父亲的音乐。甚至，她还听到了“她自己的人生和她自己的未来”而她自己的未来中，一切都是敞开的，一切都是困难的，但是那歌在那儿。那就是他们栖身为爱的歌，那么她只要在这乐声中栖身就好了，她哪儿都不想去……

《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首“爱的歌”。因为从相识的那一刻起，阿斯勒与阿莉达的人生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那怕经历了再多的磨难、分离，甚至死亡，都无法将他们分开。似乎是为了展现命运的连贯性，整本《三部曲》的自然段没有一个以句号作结。这预示着，只要故事没有终结，人生就不会停止。尽管在阿斯勒死后，阿莉达带着年幼的西格瓦尔德回到家乡，但她仍然相信阿斯勒一直在她身边，从未远离，就像围绕着她的那片海。它时时翻起惊涛骇浪，不断拍打着堤岸，似乎永远不会有片刻停歇。而当阿莉达站在海边，她就和阿斯勒站在了一起。此时，就像福瑟所说，“所有的寒冷都是温暖的，所有的海水都是阿斯勒，然后她继续往深处走而这样阿斯勒就完全环绕着她了，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晚上一样，在杜尔基亚他第一次为舞会演奏而一切都只是阿斯勒和阿莉达……”

教育理想主义的一面旗帜

读凌卫民的教育学专著《丰碑长存》

■ 陈思和

明年2025年是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等前辈创办的立达学园建校百年。松江区立达中学首任校长凌卫民先生写了一部研究、弘扬立达办学理想和精神传统的大书《丰碑长存》（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我读这部书稿，首先吸引我的是书前的两篇序言，两位作者都毕业于立达中学的前身——松江三中，他们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恢复立达校名、重树立达理想的过程中，亲力亲为，作出了重要贡献。凌卫民先生是受命于松江区教育局的重托，在校长岗位上大刀阔斧进行教学改革，成功地立达学园的办学理念与当下的中学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他不仅仅运用、开拓立达学园的牌子，更重要的是真诚地在实践中贯彻立达学园的办学理念，弘扬了立达中学教育领域最为可贵的教育理想主义。关于这一情况，两位作者都非常了解，他们在序言中已经有了清晰的阐述并给予高度评价。我未读此书已被这两篇序言所感动。如果没有松江区和区教育局的领导层面高瞻远瞩、认同并推行立达学园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的经验，那么，凌校长也不可能拥有这么一个有声有色的工作平台；反过来，正因为凌校长具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和勇于实践的探索精神，才能够在当代教育领域开拓出这么一个果实累累的“试验田”，以此证明现代教育史上的立达学园，曾经是用五四新文化理想精神贯彻教育事业的一面旗帜；而现在的立达中学，在教育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依然是一面迎着时代罡风高扬的旗帜，教育就是需要理想主义的照耀。

我与凌校长见面不多。记得还是在2009年，立达中学与巴金研究会、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匡互生与立达学园教育思想研究报告座谈会”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我与他有过几次交流，我很赞赏凌校长这样的有理想有行动还有热情、敢作敢为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在他的工作中，我似乎看到了匡互生、陶行知、黄炎培等大教育家的可贵灵魂在当代复活。当然时代不一样，工作环境不一样，工作方式和呈现形式也不一样，然而，心里的那一团理想之火是不会熄灭的，因为他心目中的立达前贤们，不是抽象的、书本的、教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榜样。凌校长把他的这本论著取名《丰碑长存》，就是含着向立达学园的前贤们致敬的意思。

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凌卫民校长是如何认真学习和领会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前贤们的教育思想，并且把他们未竟的教育事业看做是自己进行实践的起点，融会贯通地结合到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去。他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立达学园所实践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群育六大教育体系的融合理念，时时把当代中学教育的实验容纳进去，在实践中形成了跨越时代的高贵对话。其实，这六大教育体系也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长期倡导、探索的主流教育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倡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60年代探索中学学生工学农劳动，参加社会实践（劳育和群育）；80年代以后又不断强调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和艺术教育（美育）。虽然人们在不同时代按照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强调了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方面，但我们把这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道路综合起来考察，发现并没有超越这六大教育体系的范围。当年一个小小的私立中学里，几位醉心于教育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实践中像农民培养园艺那样精心培养学生，他们在实践中培育出六大教育体系的思想种子，孕育了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伟大理想。凌校长在书里几次提到我在那次座谈会上说过的话，他说我曾强调立达学园提倡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甚至可以说，立达学园的教育思想领先时代一百年。”当时我是即兴演讲，没有讲稿，我已经想不起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是这个意见，今天看来仍然是对的。

座谈会是2009年举办的，现在又过去了15年，立达学园很快就要迎来百年校庆。100年的中国教育实践道路可以证实这一点，立达学园当年实践的六大教育体系一点也不过时，只不过人们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往往是在强调了一两个方面而疏忽了其他方面。譬如在我的中学时期，中学教育一直强调工学农，不断组织学生去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美其名曰：走进社会实践大课堂。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和社会合作精神，多接触社会，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当时主流的教育思想却因此而排斥知识教育，破坏了正常的德育教育，粗暴批判美育教育，那就是非常错误的；反之，现在流行功利主义的教育，一味强调学生绩点、分数，把高考考卷作唯一的目标，智育美育也许是得到了重视，却忽视了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劳动教育和社会服务精神的培养，那么，德育教育也一定是空洞的、不完整的。所以我要说：立达学园的的教育思想领先时代100年。同时也应该说：现在我们是到了全面地整合六大教育体系的时候了，以凌校长主持的立达中学为榜样，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个六大教育体系融汇贯通的崭新的教育时代。

谈到立达学园的教育理想，就绕不过立达学园的主要创办人匡互生先生。前几年流行过几部描写五四运动的电视连续剧，对匡互生这个角色介绍不多，镜头一晃而过，观众可能对他印象不深。这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文学评论家。

大四学生，却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急先锋——火烧赵家楼，他是打头阵的人。五四事件过后，许多学生领袖都成了一时的明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都把这个光荣经历当成了进入庙堂的本钱，唯有匡互生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离开了聒噪的知识界和政界，转向了民间社会，从事教育工作。他从小学教师做起，一直到创办立达学园，成为一个以实践著称的理想主义教育家。我想，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就在于理想主义的实践。五四的理想是改造国民意识，清理封建遗毒，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匡互生没有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社会名流去指点江山，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教育事业，实实在在地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进行理想主义的教育实践。我认同这样的人格力量，它体现了五四的精神原则。

关于这些想法，也不是当年我在座谈会上要表达的意思。我只是一个研究巴金思想与传记的学者，巴金先生与匡互生先生既是同志又是朋友，立达学园许多前辈也都是巴金先生的朋友，由此产生了许多亲切感和联想。我并没有认真研究匡互生的思想和事业，只是对他所选择的民间岗位的人生道路和实践精神，始终充满敬意。近年来，也许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特征吧，每当新旧文化范式急剧更替，或者是社会心态普遍浮躁之时，或者是新媒体、自媒体大显神通之际，自会有一批批新人蜂起，风云际会，通过某些社会热点事件而迅速成为网红，成为大咖，也可以成为明星式的学者、文人或者闻人，很快就会被媒体、被社会舆论所津津乐道，被捧得高高的，在那儿代表着一种“高雅文化”。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浮躁的文化现象，而真正的大智大勇者，他是注定要离开这些名利场的。他会拒绝让那些聚光灯照到自己身上，他们会自觉跑到民众最需要的地方，默默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匡互生就是这样认真实践过的一位先驱者。

我读了这本书，不仅完整地了解了匡互生先生的教育理想和立达学园的在教育史上的重要贡献，也进一步了解了凌校长主持立达中学的光荣使命。凌校长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匡互生和立达学园的学者，他更是一个坚守在岗位上的教育工作者。从凌校长的实践精神中，我忍不住回到自己曾经走过的一段人生道路。在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还年轻的我与凌校长一样，心里满满地装着新文学前辈（鲁迅、胡风、贾植芳、巴金、匡互生、吴朗西等）的理想，天真地用理想主义指导自己从事的教育、编辑、出版、事功等实践。现在回想起那段时期的追求和实践，我的心里依然觉得有一团火在燃烧——有理想的人是幸福的人。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世纪“大转型”

■ 杨玉静

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的作者布鲁斯·M.S.坎贝尔从全球史的角度，引用大量统计信息，描述大转型时期（13世纪末到15世纪末）的物理和生物过程与发展，指出“东西方大分流的根源在于大转型的完成”，之后西方经济命运更上层楼，而东方则每况愈下。大转型改变了东西方的经济模式——东方是商业化程度和技术相对先进但停滞不前的旧式经济，西方则是复杂的、进行侵略性竞争的海洋经济。

坎贝尔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晚期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史，他的研究和教学跨越科学和人文领域的许多学科，尤其关注14世纪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作者指出，13-15世纪的大转型是一个内在的历史现象，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独特关联，例如全球气候变化和致命的牲畜及人类瘟疫的肆虐，以及持续的战争、商业衰退、经济萧条、通货短缺和旧世界人口的大规模萎缩等，这些因素引发、塑造并最终决定了大转型的进程。其中，作者尤其关注三方面的关键转型：大气环流模式的转变（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小冰期）、鼠疫带来的疾病异常、人口水平（上升/下降）。同时，作者也分析了大转型过程中掺杂的亚欧商业、政治、宗教和军事因子。

作者强调，塑造和决定大转型进程和走向的是多重因素之间动态、多维度

的互动。环境因素加上人为因素（即“核心六要素”：气候、生态系统、微生物、人类、生物、社会），在动态平衡中共同塑造历史进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蝴蝶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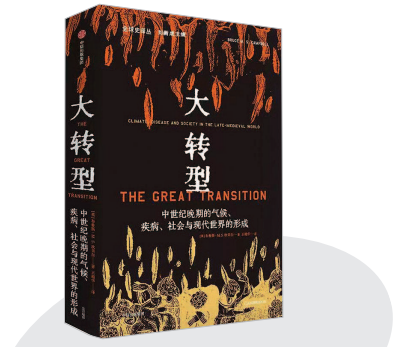
曾有很多学者试图阐释中世纪大转型发生的原因和历史进程，他们曾考察大转型的不同层面，但都难以完全解释大转型进程中的所有现象和影响因素。由于大转型的持续时间、地理覆盖面积广，它需要超越国家历史书写的分析，而不是仅仅由单个学科或者依靠某一个国家的统计信息、史料记载能够阐释清楚。

本书第一次从全球史视角，追溯了大转型所涉及的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全球化发展历程，为理解和认识大转型时期的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作者不仅关注跨越国家和种族的商业经济、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还追问了全球空间内不同文明互动的自然环境、疾病、观念变迁等现象的来龙去脉，对所涉及的过往气候、鼠疫耶尔森菌基因、历史国民收入等因素，都进行了关联分析，试图重构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复原历史全貌。而作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大转型的结果趋向于不可预测，经济或生态的发展并没

有铁律，偶然性在自然和人类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将大转型看作是历史的偶然，但本书在写作结构上遵循了严谨的逻辑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了大转型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且遵循了欧洲的历史书写传统，提供了11-16世纪初丰富详实的数据用学术支撑，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如在人口、疾病与经济社会的关联分析层面，作者指出鼠疫和黑死病引发了人类大量死亡，但同时减轻了社会压力以及土地、资源负担。在更大的人类生存空间层面，作者利用高分辨率时间序列解释气候变化，用气候的遥相关来解释欧洲和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大致同步性；宋代的繁荣与欧洲的商业革命；极端自然事件的交替发生，导致了朝代更替和制度变迁，以及后续的人口和经济衰退等。

鉴于气候因素的不可控性及其在大转型时期起到的影响，作者提出：为什么在面对自然危机时，有些社会会脆弱，而另一些社会却更具韧性？全球气候重组时期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和生存危机，促使研究者和读者思考如何建立抵抗冲击和压力的更具韧性的社会系统。尽管作者强调了历史的内在偶然性，但本书所提供的数据支撑和全球视野下的社会-生态分析，无疑给人们带来研究路径和视野的多重可能性。



《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英]布鲁斯·M.S.坎贝尔 著
王超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遍地是黄金”，在第二个千年初，宋朝在世界经济和技术大潮中稳立潮头，而此时欧洲的发展程度并不高。然而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欧洲最有活力的地区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从14世纪开始，中国丧失了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之路发展的机会。到15世纪，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历史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欧洲开启一路领跑。这一转变是何时开始的？东西方大分流是什么时候酝酿并完成转折？历史进程是如何转向的？英国经济史教授、《大转型：中世纪